

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

潘年英 著

扶贫 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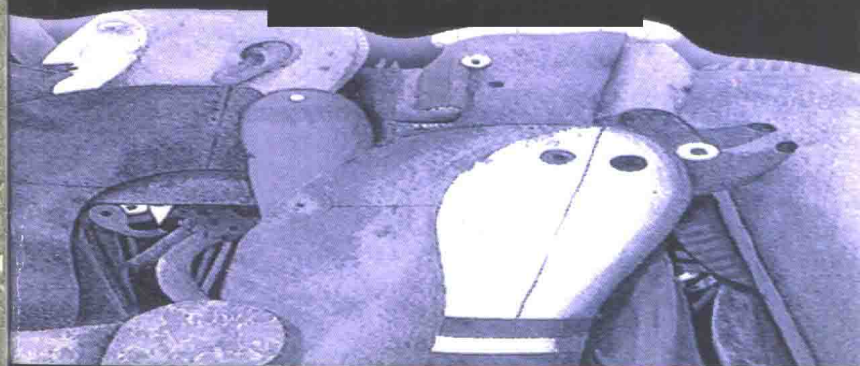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潘年英 著

扶贫 手记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周艳梅

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

扶 贫 手 记

潘年英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06,000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21-0731-0/I·1311 定价：9.00元

文 化 人 类 学 笔



作者简介

潘年英，生于1963年5月，侗族，从小在贵州农村长大，干过各种农活。后长期从事人类学及民族文化研究。已出版《黔中苗族真实生活》、《民族·民俗·民间》等著作多种。现为副研究员。



内 容 提 要

作者以饱含情感的优美文笔，娓娓叙说了一年扶贫工作的种种体验和感受，同时从人类学的学科视野和角度，分析和探讨政府扶贫行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贫困存在、发生的影响和作用。观点鲜明，见解独到，其中涉及到的若干理论问题，发人深思。

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

主编 彭兆荣

编委 王铭铭 叶舒宪

易中天 徐新建

谨以此书

告慰我父亲的
在天之灵

编者献辞——

“地球村”的概念使地球“变小”。

人类,不,严格地说是“人的家庭”却在变大。西文 family 在人类学里面可归到“人科”这样一个更广泛的背景里来看待。

人类生产和生殖的直接后果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讲究欣欣向荣、人丁兴旺。家庭伦理讲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行最通俗的说法却是人口爆炸。无论人口增长带给社会“正值”还是“负值”,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变大了。

只理解到这一层面还远远不够。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

过程中不断地使自己聪明起来,从而与其他生物的距离越来越远。人类学有一个普通的术语“图腾”(Totem),原系印第安方言土语,意思是“他的亲族”。这个术语之所以波及面这么宽,因为它说明在人类原始阶段,普遍存在一种将自己与其他生物放在一个不分彼此的层面上来认识,某一种与人们关系密切的动物、植物也就成了“亲族”。今天,人类的这种认识已经远去、疏淡。因此,无论从生物的进化还是思维发展的意义看,人类变大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机器人早已经不再新鲜。它替代了人类繁重的工作,它的有些“本领”远比人类大得多。再比如最近“克隆羊”技术的出现,把人类带进到可以复制其他生物甚至人类自己的阶段。人们相信,只要愿意,人类现在或者将来的某个时候,可以在生物领域“制造”出以往人们只在神话中听见的“半人半兽”。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帮助人类去了解祖先做梦也想不到的事物。今天的航天飞机飞到地球以外的星体上去了。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变大了。

人类除了了解其他事物,还有一项任务

——了解自己。人类有两大属性：生物性和社会性。“社会人”的精彩之处在于其文化。文化可以将中国人、英国人、日本人等从国籍上区分开来；可以把汉族人、苗族人、纳西族人在族性上区分开来。甚至可以进一步把这一地域、这一人群与另一地域、另一人群从习俗等方面区分开来。文化可以将自己与祖先进行历时性串联；也可以作你、我、他的共时性比较。这一切无不将人们对自己的认识提升到了空前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变大了。

人需要不断地了解自身，了解在新的情况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人类学可以帮助做到这一点。

在中国，人类学是一门既老且新的学科。说它老，指学科的思想依据可以上溯远古。在西方，“人类学”由亚里士多德首创，作为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则诞生在十九世纪中叶。怎么说，它也是位皓首长须的世纪老人了。说它新，一是指人类学属于标准的“舶来品”，来中国已是晚近的事情。本世纪初，我国就有一些学人致力于将这门学科介绍、引入，教学和研究也同步进行。也出现了一批影响力波及海内外的

大学者。但不管怎么说,人类学是一门迟到的学科。二是由于人类学在西方的产生与殖民主义扩张一并形成,殖民主义扩张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类学的职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人类学这个“婴儿”便一度与殖民主义“洗澡水”一起给倒掉了。直至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初,人类学才重新在中国复兴。在许多人的眼里,它完全是一门新学科。

人类学同时是一门“大”而“小”的科学。说它“大”,一则指凡属人类之事务、事象、事理皆可纳入。二是指人类学研究强调普同性、整体性、整合性和事物间的相互关系,这使得其他学科无法在这个高度上与之比拟。说它“小”,指人类学研究要求从最具体、最细微处入手,讲求实地调查,也就是所谓的“田野作业”;讲求参与观察;讲求长时间与被调查者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身体力行。这一切决定了人类学调查资料的真切和细致。用“以小见大”来说明人类学的品质再合适不过。

人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人的科学。人类社会越是发展,人类也就越需要正视自我。可惜,长期以来,出现了人类学成为人类学家们的

专利品的倾向。从广宽的“田野”走进庄严的学术殿堂,致使一般百姓望而却步。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它的品质。

有鉴于此,目前一批相当活跃的我国中青年人类学者和相关学科的专家达成一个共识,将人类学在中国的普及当作一项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并在 1996 年 8 月间,发起和策划了这一套“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我们的设想得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促成我们将良好愿望变为了今天的现实。

我们真诚希望,人类与人类学靠得近一些、再近一些。

《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编委会

1997 年 3 月

换一种角度看贫困/(代序)/李立鹤

较长时间以来,贫困现象及贫困问题一直成为人们广泛谈论的话题。中国本身是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本来十分滞后,贫困现象自然普遍存在;而中国广阔的地域及发展的不平衡,更容易显现出那种捉襟见肘的地区差异。八十年代实施改革开放后,基于一种“梯度理论”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格局,相对贫困现象日显突出。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反梯度理论”,呼吁决策者在给予东部地区各种政策优惠的同时也应给予西部相应的政策倾斜,以此缩小或缓解日益拉大的差距和矛盾。大约这是较早时候的关于中国贫困问题的一种学术声音。这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王小强、白南风的《富饶的贫困》

(1985)、郭凡生的《贫困与发展》(1987),都曾引起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和重视,成为一段时间的热门话题。九十年代后,东西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西部贫困更加突出,于是理论界再次掀起了讨论贫困问题的热潮。不过,与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关于贫困问题探讨的兴趣不再局限于经济和新闻界,而是扩大到了学术界的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最近则以人类学界的投入较为引人注目。《扶贫手记》便是其中的成果之一。

这是一本从形式到内容都较为别致的书,其之所以别致就在于它是以个人经历为背景的“笔记”体的学术研究著作,具有亲历性、真实性和可读性的特点,而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著作。本书的内容取材于作者自己在1996年被单位派往中国贵州黔南某镇挂职扶贫的生活经历,作者以其优美的文笔,娓娓叙说了一年扶贫工作的种种体验和感受,同时从人类学的学科视野和角度,分析和探讨了政府扶贫行为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贫困存在和发生的影响及作用。应该说,这不仅是一部内容独特的优秀“散文”,而且是一本风格别致

的学术著作,据我所知这似乎也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政府扶贫行为的“扶贫学”著作。书中作者观点鲜明,见解独到,其中涉及的若干理论问题的确发人深思。

本书主要围绕着扶贫实践而展开讨论,全书共有八个章节,每个章节的内容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其第一章为“绪言”,叙述“下挂干部”的由来和过程;第二章探讨“基层的结构和功能”;第三章描述“官”和“民”的冲突的实质;第四章是从民间文化的角度探讨“宗族复兴”的背景根源;第五章讨论体制与贫困的关系;第六章是“我的扶贫生活的深度描写”;第七章专门论述从人类学的角度如何看“贫困”现象;第八章是本书的结论部分,再次重申本书观点并探讨研究贫困的意义。全书主题明确,思路清晰。作者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贫困不仅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更是一种“主观”的存在。所谓“客观”的存在就是指各种客观自然条件形成的绝对贫困或一定的 GNP 意义上的贫困;而所谓“主观”的存在即是由于政府人为的造就及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片面理解的贫困。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独到且

确有见地的新观点和新思维。

作者认为,长期以来,由于我们过于强调从单纯经济学的意义上理解贫困,即以 GNP 为衡量贫困与否的主要指标,因而导致对贫困的片面理解,并由于这种片面的理解而更加剧了贫困的迅速扩大和蔓延。作者提出,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理解,比如从人类学的角度上理解,衡量贫困的标准就绝不仅仅只有一个指标,因而对贫困地区的开发也就不仅仅只有一种所谓的“现代化”或“工业化”的模式。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没有“换一个角度理解”,所以导致普遍的盲目无序的开发,从而不仅破坏了原有的“富裕”的资源和环境,而且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绝对贫困。

作者的观点的确很有启发意义。联系近年来国际上对于环保问题的不断呼吁和重视,我们很容易发现许多原来视为“极贫”的地区事实上也存在着另一方面的“富有”,即自然资源 and 环境的“富有”。而对于这样一些地区,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也的确不一定都要通过“工业化”的道路来完成。而且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更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事实。如泰国山区靠种